

准备好了么,经济转型将是艰巨的持久战

——读《美元复兴十年? or 中国痛苦十年?》



◎叶雷

对中国的未来,有乐观论者,也有悲观论者。中华智库创办人张庭宾在其新著《美元复兴十年?or 中国痛苦十年?》中大言不惭地代表了目前一股较为悲观的判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中国若把控不好,或将是下一个危机爆发地;未来十年,美元复兴,中国必须高度警惕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前车之鉴。

之所以“美元复兴十年”导致了“中国痛苦十年”,张庭宾的直接逻辑是货币因素:“由于政府大规模消费和投资浪费的顽症,加上国企未能成功改造成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造成双重流动性紧缩,因而不得不借助外商直接投资维持繁荣增长;当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增长达到顶峰的时刻,不得不以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热钱投机而维持虚幻繁荣增长。”之所以得出“中国国内流动性基本靠海外流入的资金来维持”的结论,根源还在于我国的“货币双发”机制,中国企业出口,获得大量美元贸易顺差,或者国际热钱投机中国的美元,都要被央行强制接手,按照当时的美元人民币汇率,向国内发行等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进入国内金融和经济系统流通。

问题在于,外部输血式的增长总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随着跨国公司获得了对中国市场的相对垄断后,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母公司回流利润,特别是美国再工业化和推行 TPP 对中国实行进口替代,我国的出口面对着空前严厉的处境,一些企业甚至连本金也在外流。而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美元将步入复兴通道,热钱借道人民币升值获利的动力消失,外加中国经济可能面对的石油、粮食和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国际热钱或将大量外流。届时,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的现状,也许就将变成人民币对外大幅贬值和对内大幅升值,流动性的萎缩将进一步逼空我国的内需、民生、企业和经济。

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淡化,而所有悲观的预言,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都是一种清醒剂,对于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正确判断是万不可缺的。更何况,基于人民币贬值可能导致大量外资外逃进而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这样的估计,是有其实际意义的,虽然人民币的前景事实上未必如此悲观。但是,我国长期对国内企业和国民个人实施的强制结汇制度,确实是造成货币超发的重要原因。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自行保留或者卖给银行;2011年起,企业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境外,无须调回境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表示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也一再表示,将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如此看来,基于外汇管理造成的我国货币超发问题,在未来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而从人民币走势的内外环境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内,人民币不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还可能继续处于升值通道。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全球资本流动呈现多向加速的特征,资本从我国单向流出的可能较小;二是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方面,我国主要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大,而对大多数贸易国

都已逆差,这反映到中美货币之间的汇率上,必然是人民币升值;三是随着12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九次部长级会议达成“巴厘岛一揽子协议”,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再朝前迈出了一步,这对中国意味着可以减少13.2%的贸易成本,按出口额计算,这将使我国每年增收2800亿美元,出口顺差扩大带来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赚钱效应及资本套利冲动会促使热钱流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

再看国内环境,一是随着新一届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加强,政府自身消费大幅下降;二是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新观念下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允许民营和外资控股国有企业,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防控债务风险列为一大任务,要求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之前各地已经相继出台严控政府投资的规定,这都是逐步解决政府资本主导投资回报率过低问题的实际步骤;三是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的加快,民营资本将大步进入银行和保险业,当下已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核准的民营银行已达20多家,随着流动性分布格局逐步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国有大银行的授信缺口之间的矛盾将在一定程度得到缓解,这也逐步增强我国内生的流动性。

至于作者有关中国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在所难免的预言,则多多少少也有“阴谋论”的底色。在他看来,中国新一轮“苦日子”开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威逼利诱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把人民币变成美元驶出沼泽的牺牲品和垫脚石的心机昭然若揭”,由此也就带来了国内流动性的紧缩,从而造成了“股灾与世界工厂休克”。接下来的“四万亿”投资计划,错过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又导致了楼市泡沫和人民币汇率泡沫的爆炸式膨胀。而“阿拉伯之春”中美内乱,极可能由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造成石油危机升级,及其可能带动的粮食危机,都将引发中国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对房地产泡沫产生重大冲击。如果此时做空国债期货,国债利率暴涨导致房贷利率跟着涨,势必刺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随着一起硬着陆。

“美元复兴十年”的判断,笔者基本上是赞成的,页岩气革命带给美国的能源独立性,科技创新优势带给美国再工业化的利好,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而来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日益改善,以及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独一无二的财富国际置换能力,都已使美国经济复苏有了足够的支撑。而且,照此趋势,美元复兴极可能不止十年,估计会有更长的周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尽管作者有关中国经济可能陷入危机的预言,尚待时间来检验。其“危言耸听”却也并非杞人忧天;其对美国的分析,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可以不以只作为相互的另一面而存在。竞争无处不在,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是一种祸害,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是一种病痛。”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最大的价值,或许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懂得控制自身的欲望。

被“双生镀金时代”所撕裂的社会

——评《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天龙

说起巨富,世人的感觉总是很复杂,既羡慕又嫉恨。羡慕,是因为巨富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别人的生活;嫉恨,要么因为绝大多数人毕其一生都跨不进那扇主流财富社会的大门,还因为在第一次的“镀金时代”,巨富的前生曾是海盗和垄断资本家,带有劫掠穷人财富的性质,在道德层面上习惯性地遭人质疑和不屑。商业记者、现任《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曾深入追踪、现场采访全世界巨富近20年,近期她把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开设十几年的专栏文章集结,推出了这本《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打开



了一扇窥探巨富秘密世界的门。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追踪的巨富,当然都是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已身陷囹圄10年,最近普京对他签署了赦免令)、墨西哥通讯巨头卡洛斯·斯利姆、法国世界奢侈品教父伯纳德·阿诺特、硅谷首富拉里·埃里森等。极少数超级巨富位居社会金字塔之尖,却左右了一个地区、一种行业的经济风向标。巴菲特的几句话,华尔街股市可能为之震荡。李嘉诚的房地产业策略稍有变化,香港金融圈就可能为之颤抖。比尔·盖茨的微软软件停止使用一周,全世界数十亿网民还不跳脚叫骂?这就是超级巨富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工薪阶层的未来。

关于当今超级巨富的产生背景,克里斯蒂娅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西方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而新兴国家正在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所以,当今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并行,简称“双生镀金时代”。

1873年,马克·吐温在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一词。第一次“镀金时代”发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工业化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时期,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艺变得无足轻重。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

20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三种转型的风靡,引领了一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顶级巨富阶层再次迅速崛起,规模扩大及全球。在西方,经济转型正在形成第二次“镀金时代”和新的巨富统治。在新兴市场,比如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技术革命、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因子活跃,数千万人因此迈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并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线。当然,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巨富们受益最大。

克里斯蒂娅认为,“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互相强化: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供应链,比如,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全球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

中国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关于当今超级巨富占有的财富量,克里斯蒂娅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于收入分布图前10%的人,其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至约33%,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回到了1940年水平。之后,这一比例强劲攀升。到2006年,该比例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的顶峰。然而,收入的最大变化不是发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前10%的内部。几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布图最顶端:在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四分之三的收入增长都流入了前1%超级巨富群体的口袋。社会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和巨富之间,也存在于超级巨富与一般富豪之间。

由此,新的问题产生,亿万巨富和百万富翁,也和穷人形成对抗。就超级巨富而言,因为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其财富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一个半个世纪前所描述的那样:“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节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而技术熟练、兢兢业业的工人,不但没有发横财,反而被那些使超级巨富更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摧毁了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那些想要到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的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的人,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更棘手的是,克里斯蒂娅在书中以美国政府为例,证明了政府干预社会贫富调节的可操作性变得越来越低。尽管这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推动制造业复兴、调高富人阶层的个税税率,但华尔街和跨国公司总能轻而易举地通过资本流动、产能转移来规避政府干预。并且,超级富豪们还是美国民间智库的最大赞助者,加强政府干预特别是加重征税的做法,总会被妖魔化,致使倡议者的政治支持率下降。

同样糟糕的是,一些超级巨富所谓的“慈善资本主义”模式,自近代起,就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大幅度减少饥饿、贫困、疾病以及改善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在野蛮殖民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新兴资本家热衷慈善捐助,但同期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济不平等现象却日益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带来的治理乱象最终促使“小政府”被终结,政府才拥有了扩大税收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权限。在新世纪,从比尔·盖茨到其他更多的硅谷新贵,同样将大量财富用在了慈善公益事业上,疾病、饥饿和“数字鸿沟”等问题却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受捐助国表现得更为严重。

但克里斯蒂娅对贫富悬殊的态度却有些犹疑,当然不可能提出解决方案及治理由贫富差距衍生出的其他经济和社会乱象的具体办法。克里斯蒂娅只是告诫大家,要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华尔街投行精英等部分超级巨富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美国经济政策、获得寻租收益),但这个思路无助于遏制财富集中度的提高之势。

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走势,社会财富如果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对国家的长久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倡导以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科学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红利。因为只要当生产者主导社会之时,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得到以自动平衡调节,如果中国能在改革中走出这样一条新型道路,那将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披沙录



《改革: 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
王尔德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2011年以来的诸多事实证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在下降,正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速增长阶段。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未来的中速增长,都离不开改革红利的推动。所以,如何重启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确保这一转换平稳着陆的关键。本书是《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王尔德近三年来对多位国内外一线官员和参与改革的重要学者访谈的辑集,这些访谈对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民权教授就认为,与其他先前成功但规模较小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我国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发展过程的早期或中期,我们就必须同时应对收入分配或更一般地说社会公平问题。因为,收入分配对扩大内需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未来十年,应实施以公平促发展的战略,争取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齐头并进。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这是一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副主任高永中主编,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承担具体采访和选编的口述史。编写组成员先后采访了几百位老同志,积累了逾千万字

的资料,所录文章均为亲历者第一人称讲述。回忆者均为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决策者,其中部分曾是高层领导人,因而本书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兼具。这些讲述回顾了35年来许多重大事件鲜为人知的细节,如审判“四人帮”台前幕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安徽的农村改革、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独生子女政策的由来、中美建交始末、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的两次“大争论”、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曲折、邓小平南方谈话细节、股份制改革历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重庆设立直辖市经过、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等。



《比特币》
一个虚幻而真实的世界
李勇 长 铁 等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2009年,比特币诞生。这是一种通过密码编码,在复杂算法的大量计算下产生的电子货币。虽然是虚拟货币,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关注热潮。这一串凝结着加密算法与运算能力的数字不仅可以安全流通、换取实物,1比特币价值甚至曾高达8000元人民币。有研究者认为,比特币已具备了打破几千年来全球货币由国家垄断发行的可能性。在不经意间,比特币引发的金融新浪潮已悄然成型。这是一场伟大的货币实验,这是一个虚幻而真实的金融世界。如何认识与思考这一实验,有助于理解互联网时代金融世界的逻辑。面对比特币引发的种种争议,针对政府、货币体系等问题,作为国内首批参与并研究比特币的开拓者,本书作者们以开放的态度、翔实的资料与读者交流,系统阐述了比特币的起源、发展、技术原理、生态圈等关键问题,深入探讨了为什么比特币受到如此追捧、比特币价格的支持体系在哪里等问题,更大胆畅想比特币现实应用的未来前景。



《重新发现上海》
(1843-1949)
一个包租区里的百年中国
王千马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自法国年鉴派历史学者大力主张从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真实以来,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大行其道。本书就是由小街道来讲述大历史的一种尝试,在时下林林总总的老上海写作中,独树一帜。如果说上海是一座见证了近代跌宕沉浮的大都会,从清末到民国再到1949年,一幕幕历史剧、惊险剧、传奇戏在这个三方共治、光怪陆离的城市轮番上演,那么上海西南角的天平社区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标本,这个面积仅2.68平方公里的社区,所承载的历史,却大得惊人。盛宣怀、席氏兄弟、蒋介石、宋子文、陈毅、宋庆龄、汪精卫、马歇尔、荣德生等一百多位历史名人都曾在这里生活过,这些人的命运曾在此交错相连。今天的天平,依然保留着这些名人的旧宅故居,留存为历史的见证。作者在一栋栋花园洋房中温故老上海的一段段往事,探寻曾经的繁华与动荡,苦难与风流。